

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

王 寅

内容提要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大多来自欧洲传统的农业社会,都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但不同的历史背景、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使他们无论在移民动机,还是进入美国后的居住模式、经济活动和政治取向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尽管如此,两大移民群体努力摒弃陈规陋习,提高自身素质,在美国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同化道路,并且为美利坚文明奉献了各自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美国 爱尔兰移民 意大利移民 多元文化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是美国两大外来民族群体,并先后构成 19 世纪涌入美国的两大移民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为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来自西北欧洲“老移民”队伍中仅次于德意志人的群体,后者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来自东南欧洲国家“新移民”队伍中人数最多者。两国移民均主要来自欧洲传统的农业社会,缺乏在美国城市谋生的技能,且信奉天主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深受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是,两国移民进入美国后积极投身各项经济活动,逐步接受新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最后都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迥然不同使两国人民在移民动机、居住模式、经济活动、政治取向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探讨两国移民在美国调适和融合历程中的共性和个性,无疑是美国多元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进入北美大陆均可追溯至欧洲人早期拓殖时期。

爱尔兰人于 16 世纪进入美洲,并于 1621 年在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美国 1790 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有 37,180 名爱尔兰人,另外约有 15 万人带有爱尔兰血统。早期爱尔兰移民主要来自母国北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 页。

<http://fisher.lib.virginia.edu/cgi-local/ccsusbin/census/cen.pl>, 2003 年 2 月 13 日。

黄兆群:《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 页。

业技术,约 25%为专业人员、业主和从事商业者或农民,40%以上为手艺人。

意大利人被称作新大陆的“发现者、探险者、殖民者和边远地区居民”。从首航美洲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其他同时代航海家和探险家,意大利人在美洲大陆开发初始阶段发挥了特殊作用。早期意大利移民同样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亚平宁半岛北部地区,其中不乏商人、艺术家、工匠、音乐家、教师和殖民者。独立战争后的数十年中,意大利移民几乎遍及美国各地。

爱尔兰和意大利人大量涌入美国发生在 19 世纪。与早期移民不同的是,他们均来自母国贫困、落后的南部地区,因灾荒和饥馑远渡重洋。

19 世纪上半叶,席卷全国的两场马铃薯疫病造成的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大批涌向国外,尤以美国为最,并在 50 年代以 91.4 万之巨达到巅峰。意大利人则因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内经济严重衰退、政府征税过重而离开故土。1881—1890 年,意大利移民进入美国的数量从前 10 年的 55,759 人飙升至 307,309 人,并在此后 10 年进一步上升至 651,893 人,以 17.7%的比例居同期外来移民之首。

19 世纪进入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大多经济窘困,没有技术,因而他们在美国的早期经济活动和生活状况也大致相同。

爱尔兰人抵美后因贫困无力继续进入内地,许多人便聚居东部各口岸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费城等。虽然后来有不少人移居中西部各地乃至太平洋沿岸,但依然群居城市之中,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1870 年,爱尔兰移民近 95%集中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34%居住在全美最大的 15 个城市中。至 1920 年,爱尔兰人 90%仍居住在都市区。

中断了与土地为传统纽带的爱尔兰移民很难在美国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从事连黑人也不愿干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苦力,不仅收入低而且备受歧视,有的雇主干脆挂出“本店概不雇佣爱尔兰人”的告示。因此,对于 19 世纪爱尔兰人而言,移居美国只不过改变了居住地,由“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他们大多仍拥塞在贫民窟“质量最差的住房里”。

意大利移民 80%以上同样居住在城市地区。他们绝大多数经由纽约入关,许多人就此落脚谋生,余者大多前往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如费城、芝加哥、底特律,也有人随着铁路铺设进入西部地区并在那儿定居。旧金山后来也成为意大利移民定居的主要城市。

在美国城市,意大利移民同样只能凭借体力加入非熟练工人的队伍,主要集中在采矿业、

克尔比·A·米勒:《阶级、文化与移民群体认同在美国:爱尔兰美国人的种族特点》(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 - American Ethnicity"), 载弗吉尼亚·扬斯-麦克劳克林编:《移民再思考:历史、社会和政治学》(Virginia Yans - Mclaughlin, ed.,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6 页。

韦恩·莫昆、查尔斯·范多伦编:《意大利美国人文献史》(Wayne Moquin and Charles Van Doren,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Italian Americans*), 普雷热出版公司 1974 年版,第 1 页。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编:《美国种族群体哈佛百科全书》(Stephen Thernstrom, et al., eds.,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剑桥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28 页。

罗杰·丹尼尔:《镀金时代的移民经历》(Roger Daniel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Gilded Age"), 载弗吉尼亚·扬斯-麦克劳克林编:《移民再思考:历史、社会和政治学》,第 66 页。

克尔比·A·米勒:《阶级、文化与移民群体认同在美国:爱尔兰美国人的种族特点》,第 126 页。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287—288 页。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 页。

建筑业和铁路建设工地,也有人进入钢铁厂、纺织厂、屠宰厂……意大利移民在“所有需要普通劳工的地方工作”,干着土生美国人和老移民所不屑的重活粗活,“忍受着美国人所能提供的最差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劳动时间长报酬却极其低廉。他们同样居住在城市贫民区,他们的涌入使贫民窟的居住环境越发拥塞,卫生条件之恶劣耸人听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国移民都因为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备受歧视和排斥。

曾几何时,爱尔兰人被视作“蛮族”。生存的压力使爱尔兰移民越发性情粗暴,酗酒、斗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为了争夺就业机会,他们不断同其他移民群体发生冲突和打斗,流血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加之爱尔兰移民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他们及德意志移民大量涌入使天主教徒在美国各种宗教信仰人数排名中从1776年第10位上升至1850年的第3位,令持宗教偏见的新教徒视作严重威胁。一时间,对于爱尔兰移民的诋毁和攻击甚嚣尘上。

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意大利移民同样难以迅速融入美国社会。意大利及东南欧移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他们的到来使美国天主教徒人数在1890年“首次以730万信徒(包括儿童)占据了首位”,彻底打破了新教在美国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引起土生白人和新教教徒的恐慌。这些人借“种族优越论”排斥新移民,认为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诸民族是低劣人种,他们若同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乃至条顿人杂居通婚,生育的后代势必会使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蜕化,使美利坚文化面临严重挑战。1887年成立的“美国保护协会”更是到处煽风点火,把美国镀金时代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归咎为新移民的到来,指责新移民将美国城市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发源地”。意大利人因其在移民中人数众多而备受攻讦,许多地方频频发生意大利人遭杀戮和私刑迫害案件。

二

19世纪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虽然大多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前往美国,但不同的历史背景、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使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

首先,他们的移民动机存在有很大不同。爱尔兰人到美国绝大多数是永久性定居,因而往往举家迁徙,两性比例相当。意大利移民则只是打算在美国短期逗留,干活挣钱,将存款带回国购地置产。严格说来,世纪之交进入美国的意大利人充其量只能说是寄居者或侨民,而非移民。他们中近90%为男性,绝大多数是16—45岁的青壮年。他们蜂拥而至,但很快接踵而去。统计资料显示,1899—1924年间有380万意大利人抵美,但约210万人同期离开,由此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移民大举迁徙入境后又大批返回故国的独特现象。随着时间推移,意大利移民越来越感到自己更适应的是美国生活,萌生永久定居美国的想法,千方百计将家人接到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隔了意大利人在大西洋上的往返,也使更多的人,尤

韦恩·莫昆等编:《意大利美国人文献史》,第98页。

理查德·N·奥斯特林:《不断变化的美国宗教》,载《交流》2000年第1期,第20页。

詹姆斯·奥尔森:《美国历史上的种族特征》(James Olson, *The Ethnic Dime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圣马丁斯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编:《美国种族群体哈佛百科全书》,第547页。

其是第二代移民,彻底摒弃了侨民意识。

其次,两国移民尽管都主要居住在城市贫民区,但居住模式和行为模式截然不同。

数百年反抗异族残暴压迫的斗争使爱尔兰人形成了强烈的群体意识。移居美国后,他们的民族感情进一步强化,因而喜欢聚居,热衷于相互帮助,共同在陌生的国土上寻求生存条件和发迹机会。爱尔兰人抵达美国后得到先来者提供的各种帮助,如职业介绍、住宿安排、医疗服务等。而新移民们一旦条件改善便慷慨资助乡民赴美或帮助在美国的困难同胞。

南部意大利人同样“带着根深蒂固的地区或地方特征来到美国”,但闭塞的乡村生活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异族入侵和封建割据使意大利自罗马帝国衰亡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部地区更是分割成语言和文化迥异自成一体独立的单位。虽然经过19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建立,但意大利移民潜意识中仍认为自己是那不勒斯人、叙拉古人、卡拉布里亚人或西西里人。此外,南部意大利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家族纽带牢牢维系着彼此依附关系,为了家族利益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在这些潜意识的双重作用下,意大利人进入美国后不像爱尔兰移民那样寻觅本民族同胞相伴为伍,而仅仅同本家族或来自同一地区乡民聚居一处,经济活动、社交、婚姻等也都局限在同族或同乡范围内,而对来自于亚平宁半岛其他地区的同胞则视若路人。诚然,意大利移民在美国城市结成数十上百个“小意大利”,他们在这些“小意大利”中聚居,讲相同的方言,过熟悉的生活,持传统的风俗习惯。然而即便在这些“小意大利”中,他们的人口比例也相当低,如1890—1920年间,芝加哥只有少数几个街区意大利移民占到居民数的50%—80%。

此外,意大利移民还要遭受本国包工头的盘剥和欺诈。利用同胞语言不通的弱点,一些在美国生活了较长时间、掌握英语并且熟悉美国经济生活的早期意大利移民通过契约手段将他们介绍到美国工作。包工头为新移民提供就业和生活的便利,但绝不是他们的“朋友”,用一句农民的话来说,他们是“吸血的蚂蟥”,从中谋取大量不义之财。还有的包工头同老板和房东联手,利用移民急于找到工作和住房的心理,压低工资抬高房租,使之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此外,两国移民的政治取向相去甚远。

爱尔兰人不满足求得经济发展,认为只有取得政治层面上的强势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美国崇尚民主自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使热衷政治的爱尔兰人有了用武之地,充分利用同胞强化了“种族和宗教内聚力”和手中选票选举能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党执掌权柄。早在1828年大选中爱尔兰人就在亚当斯和杰克逊之间的较量中起了重要作用——纷纷涌向投票站将选票投给杰克逊这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4年后,他们又在杰克逊与“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的总统候选人角逐中如法炮制。爱尔兰移民对民主党情有独钟,当其他外来移民因个人因素支持不同政党时,他们几乎一致拥戴民主党,并在民主党内形成一定的势力。爱尔兰人大多能言善辩,会说英语,能够从容地“进入美国政治而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一战

詹姆斯·P·申顿:《种族和移民》,载埃里克·方纳等:《新美国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编:《美国种族群体哈佛百科全书》,第548页。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6页。

卡尔·威特基:《爱尔兰人在美国》(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页。

后,爱裔当选联邦各级议会议员,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的人数逐渐增多。国会中爱裔议员数一度是其他所有族群议员数总和的一倍以上。马萨诸塞州爱裔望族后代约翰·肯尼迪赢得1960年总统大选胜利入主白宫。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样具有爱尔兰血统。

意大利人则大多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初到美国举步维艰,黑手党活动和二战期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更使他们雪上加霜。意大利移民在很长时间里认识不到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入籍率一度很低。后来即使入了籍,他们仍缺乏公民意识。很多人甚至不到投票站投票,致使原本不多的意裔候选人无法得到足够多的选票。“小意大利”居住模式使意大利移民尽管曾经是仅次于德意志移民的第二大群体且群居城市,却如一盘散沙形成不了左右形势的力量。

诚然,意裔政治家后来也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二战后在美国政坛的影响日益增大,不少人任职联邦各级机构乃至内阁,但意裔从政人员鱼龙混杂相对比较复杂。他们中有的被黑手党拉拢腐蚀,有的本身就是政客置身黑手党保护伞下,还有的是发了迹的黑手党徒跻身上流社会。黑手党还同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在司法、新闻、警察等界建立层层密密的关系网,其手段之卑鄙,危害之凶险,一度令公众谈虎色变。这使美国公众对意裔官员产生许多不良看法。这些人虽然是意大利移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使其他人备受牵连,给他们在美国的同化道路增添了曲折和羁绊。

三

在种族杂居文化多元的美利坚合众国,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曾经被视为不可同化的移民,然而“所有的移民,无论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的,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他们的新环境”。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也不例外。他们不断自我调适,摒弃原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以适应美利坚文化,最后都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究其原因,其中固然有他们都来自欧洲,共同的欧罗巴文化使他们远比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移民更容易接受美国文化的因素,但还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共同点。

第一,两国移民都积极参加美国经济活动,构成劳动力大军的主流队伍。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济发展大潮为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之先后构成了庞大的非熟练劳工大军,既成为许多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也帮助他们走出贫民区进入主流社会。

爱尔兰移民是美国19世纪交通运输线路的主要建设者。“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运河水系大都由爱尔兰劳工挖掘,中西部的铁路大都由爱尔兰劳工建筑。”他们还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38,000多名爱尔兰劳工承担了该铁路东段的

卡尔·N·德格勒:《经济革命时代,1876—1900》,第164页。

塞缪尔·L·贝利:《跨文化比较与移民史著述:关于如何研究意大利人在新世界的一些想法》(Samuel L. Baily, “Cross - Cultural Comparison and the Writing of Migration History: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Study Italians in the New World”),载弗吉尼亚·扬斯·麦克劳克林编:《移民再思考:历史、社会和政治学》,第247页。

罗杰·丹尼尔:《镀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第74—75页。

建设任务！爱尔兰人的到来更使美国工业基地东北部工厂获得了急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他们还逐渐在美国城市中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在母国农业生产中世代相传的驭马本领使他们垄断了美国城市客栈、出租车行马夫和马车驭手的工作，传统的屠宰业、磨坊、锯木厂等也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

在美国城市，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移民同样只能凭借体力加入非熟练工人队伍。他们接替爱尔兰移民，成为劳工大军的主体力量。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极其广泛，但大多集中在采矿业、建筑业和铁路建设工地，也有不少人进入钢铁厂、纺织厂、屠宰厂……意大利移民在“所有需要普通劳工的地方工作”。另有一些从事其他职业，如裁缝、理发师、商贩、小商铺和小饭店业主等。由于南部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原本是自耕农，他们中也有人到南方种植棉花、水稻或到西部从事葡萄、柑橘等水果栽培或蔬菜种植。还有，意大利传统的酿酒技术也使他们在美国大显身手。

第二，组建民族社团帮助同胞克服困难摒弃旧习。

土生美国人往往错误地认为，移民建立民族社团或会社将在美利坚大地上重构他们在旧世界的生活圈子，恪守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正是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和运作，为困难同胞提供保护和帮助，使之逐步适应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利坚文化，最后“蜕变”成为“新人”。

爱尔兰移民对经济问题特别敏感，他们往往联手行动，共同反抗业主的剥削和欺压。他们还组织许多互助社团，先是资助乡亲离开灾难深重的母国，抵美后又帮助他们安家立业。随着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政治势力日益扩大，爱尔兰人中的党魁和宗教领袖开始关注提高本族移民素质，倡导自律勤奋节俭体面做人。他们组织了许多协会，如爱尔兰天主教慈善会、天主教戒酒会等，帮助同胞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斗争，使之不再成为招惹是非的群氓、破坏社会治安的地痞，而是积极参与社区乃至城市管理的有生力量。

面对新世界的挑战和排斥，意大利移民意识到传统的家族纽带不足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便结成互助社团彼此关照。亚平宁半岛移民开始“产生了最初的意识——他们享有意大利共同的遗产”。梗阻在意大利人之间的沟壑渐渐淡化，各种为全体意大利移民活动的民族社团相继成立，1905年6月在纽约成立的“美国意大利之子会”为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组织，至1921年发展到拥有125,000会员和887个地方分会。意大利会社管理规范，服务接近于现代保险业务，会员付费虽不多却可以在必要时候得到一定资助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进一步吸引会员，会社还将服务范围从基本的救济功能扩大到娱乐和社交活动。针对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文化测验法》限制外来移民的做法，意大利移民成立“美国意大利裔组织”，发表文章四处游说出席听证会，以大量事实驳斥排外主义者对新移民的种种不实之词。

第三，改变轻视教育的传统偏见，通过教育提高同胞素质。

英国殖民统治爱尔兰数百年，客观上造成了爱尔兰人的“不开化”。为了促进天主教发展，

罗杰·丹尼尔：《镀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第75页。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编：《美国种族群体哈佛百科全书》，第545页。

也为了使后代在新教国家继续父辈的宗教信仰和更好地在美国生存,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建立了数十所教会学校——虽然刚开始时这些学校规模很小,不少教室设在教堂地下室。美国内战后教会学校得到改善,许多主教辖区不仅扩建增建了小学,还兴办中学,使爱尔兰子女得以接受更高等教育。至1900年,一些爱裔学生进入教会办的高校。

家族观念和农民意识曾使南部意大利人极度轻视教育。“1899至1910年间在美国的南部意大利人是东南欧移民群体中文盲率最高者”。即便到了美国,他们开始时仍拒绝让子女入学,惟恐子女接受教育会造成“对家庭神圣性的一种侵犯”,更何况还会给家庭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义务教育法通过后,意大利移民不得不将子女送进学校,但仍要他们放学后就去干活,年满14岁的子女一旦获得工作许可,就逼着他们辍学就业。美利坚文化的熏陶使意大利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懂得教育是子女谋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意大利移民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虽然他们大多将子女送进公立学校。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也开始进入宗教机构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创办的各种学校和会所。这些机构提供英语和公民学课程,还有的教授数学、文学、历史、政治等,不定期地举办音乐会、舞会和讨论会。这些课程和活动对于帮助意大利移民学讲英语,适应美国生活方式,培养公民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淡化民族意识,走出狭隘的族群圈子。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流动的增强以及与土生美国人和其他外来民族的交流增多,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他们同异族通婚的现象中。1860年,“只有1/10的爱尔兰移民同异族通婚”,波士顿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爱裔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伉俪的比例超过半数。如果说早期成功的爱尔兰移民往往会羞于承认或暴露自己是爱尔兰人,如约瑟夫·肯尼迪的母亲坚持要儿子在给哥伦比亚信托公司送包裹时称自己为“乔”而不是“乔·肯尼迪”以“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那么100年后异族通婚已使许多爱裔难以鉴别族属,甚至被归类于其他种族。二战后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素质也和1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到美国不再寻找——其实已经难以找到——本国移民的聚居地,这种局面促使他们尽快融入美国社会。

同样,“自19世纪末以来入境的数百万意大利移民,也因其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很多人失去了原有的民族身份”,虽然第一代南部意大利移民曾经希望在美国继续传统的家庭生活。意大利移民子女在新旧世界的文化冲突和对比中,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一面。他们对新事物了解越多,就越渴望摆脱家族的控制和羁绊。他们对由父母为他们在来自同一村庄或地区的移民中间挑选配偶的传统婚配方式感到不满。从第二代移民开始,意大利人内婚率呈下降趋势。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意裔同其他民族通婚率不断上升,加速了他们同其他移民群体乃至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编:《美国种族群体哈佛百科全书》,第554页。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42、51页。

罗纳德·凯斯勒:《肯尼迪王朝:一个家族的神话》,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四

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筚路蓝缕但殊途同归,走过一条从格格不入到不断调适融合的道路。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并没有消失在美利坚“熔炉”中,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本民族文化遗产,并将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融入美国文化。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使两国移民在不同的层面上丰富了美利坚文明。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城市和罗马天主教会建设中成绩斐然。

美国镀金时代高速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为热衷政治的爱尔兰人提供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极好机会。爱尔兰政客和党魁成为显赫一时的“城市老板”、“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人物”。爱尔兰城市老板为选民提供各种服务,如职业介绍、生活救济、医药服务、筹措互济金等,使美国“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他们为城市管理引进的“爱尔兰方式”大大拓展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内容。爱尔兰城市老板控制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和当地的政治选举,使纽约几乎成了爱尔兰人的天下,而他们在纽约市政管理中的许多平民化举措,影响了美国其他许多城市,使之也纷纷“把权力交给了下层阶级的代表”,给尚处萌发状态的美国现代城市奠定了基础,尽管他们并不善于城市管理,采用的手段也大有可质疑之处。

爱尔兰移民还为罗马天主教在美国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美国宗教教派林立,为创建理想中的“山巅之城”而前往北美荒原的清教徒移民始祖确立了新教在这个国家的主流地位。虽然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天主教徒参加了北美大陆早期开发和建设,并于1634年在马里兰正式建立教会,但天主教只不过是美国“新教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没能建立统一教会。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和德意志天主教徒移民大量涌入才改变。爱尔兰教徒到哪里谋生就把教堂建造到哪里,使天主教堂星星点点散布在美国许多地方。爱尔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则随教徒深入各地,不仅为本国移民布道传教,还为其他国家天主教移民提供指导,使之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

为了适应天主教事业发展,爱尔兰移民从母国输送大量神职人员到美国。仅都柏林万圣学院1842年建校后的60年间,就向美国输送了1500名神父。爱尔兰神职人员在对美国天主教会发展和辖区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关于1789—1935年美国主教的一份调查显示,“被任命的464名主教中,268名为爱尔兰人”。其时,美国几乎任何一个主教辖区或大主教辖区都有爱尔兰出生或具有爱尔兰血统的高级神父。虽然这种现象遭到其他移民群体中天主教徒们的反对和抵制,但充分反映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作用。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2—298页。

卡尔·N.德格勒:《经济革命时代,1876—1900》,第163页。

罗杰·丹尼尔:《镀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第76页。

卡尔·威特基:《爱尔兰人在美国》,第91—92页。

意大利移民则为美国奉献了璀璨的古罗马文明,包括雕塑、建筑、绘画、音乐、歌剧等。

早期意大利工匠和艺术家就在美国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如18世纪雕塑家吉乌塞帕·塞里希为一些著名政治家绘制栩栩如生的系列肖像,康斯坦丁诺·布鲁米迪历时11个月创作了国会大厦中央大厅巨幅天顶画《天堂中的华盛顿》。近代意大利建筑师则成功地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和美国建筑融为一体,使古罗马风格建筑物出现在美国许多地方。

随世纪之交移民大军进入美国的意大利文艺工作者带来了优秀的传统歌剧和音乐。1883年,美国最具声望的歌剧院——大都会歌剧院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城三十九大街举行揭幕演出,首席指挥就是著名的意大利人克莱凡特·坎帕尼尼。从那以后至1966年歌剧院迁入六十六大街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83年中,大都会歌剧院“共计有101名指挥,其中34名是意大利人”,并有“约1,600名著名歌星在那儿登台演出,其中至少有354人是意大利人”。直至今日,意裔指挥家和歌唱家在美国仍享有盛名。

还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移民虽然逐步被同化,但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饮食习惯却完好地保留下来,使美国公众得以享用意大利传统食品,包括500多种形状各异、口味不同的面制品。意大利移民还使传统烹调方式经受了美国化的过程,从而广泛进入美国人的餐桌。如今,意大利食品构成了美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崛起的快餐业中,意大利比萨饼和烤馅饼更是受到美国公众青睐。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将美国比作“欧罗巴的孩子”。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虽然都来自欧洲,但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及传统习惯使他们一度在美国深受歧视和排斥。然而他们在同新教主流文化的冲突中努力摒弃陈规陋习,提高自身素质,逐步适应美国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同许多外来移民一样,在以自己的鲜血、汗水和聪明才智为美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以各自的民族素质和优秀文化为美利坚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财富,尽管其中也包括一些负面因素。而美国这个“多民族的民族”正是在主流社会与各国移民的冲突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同化各国移民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博采世界民族文化之精华从而使美利坚文化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移民群体的调适与美国社会的同化谱就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移民国家的一个主旋律。

[本文作者王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062]

(责任编辑:任灵兰)